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中国雕塑史^①

我国言艺术者，每以书画并提。好古之士，间或兼谈金石，而其对金石之观念，仍以书法为主。故殷周铜器，其市价每以字之多寡而定；其有字者，价每数十倍于无字者，其形式之美丑，购者多忽略之。此金钱之价格，虽不足以作艺术评判之标准，然而一般人对于金石之看法，固已可见矣。乾隆为清代收藏最富之帝皇，然其所致亦多书画及铜器，未尝有真正之雕塑物也。至于普通玩碑帖者，多注意碑文字体，鲜有注意及碑之其他部分者；虽碑板收藏极博之人，若询以碑之其他部分，鲜能以对。盖历来社会一般观念，均以雕刻作为“雕虫小技”，士大夫不道也。

然而艺术之始，雕塑为先。盖在先民穴居野处之时，必先凿石为器，以谋生存；其后既有居室，乃作绘事，故雕塑之术，实始于石器时代，艺术之最古者也。

此最古而最重要之艺术，向为国人所忽略。考之古籍，鲜有提及；画谱画录中偶或述其事而未得其详。欲周游国内，遍访名迹，则兵匪满地，行路艰难。故在今日欲从事于中国古雕塑之研究，实匪浅易。幸而——抑不幸——外国各大美术馆，对于我国雕塑多搜罗完备，按时分类，条理井然，便于研究。著名学者，如日本之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法国之伯希和（Paul Pelliot），沙畹（Edouard Chavannes），瑞典之喜龙仁（Oswald Siren）等，俱有著述，供我南车。而国人之著述反无一足道者，能无有愧？今在东北大学讲此，不得不借重于外国诸先生及各美术馆之收藏，甚望日后战争结束，得畅游中国，以补订斯篇之不足也校注^①。

^① 本稿系梁先生在东北大学时的讲课提纲，成于 1930 年。

^① 上文末段说“今在东北大学讲此”。在三代——夏又提到“去年殷墟发掘出的石像”，按此像出土于 1929 年秋季第三次发掘。故可肯定此稿作于 1930 年。而全文异常简略，尤以秦代一节为甚，可知为当时讲课所用的提纲，尚非正式的“史”。当时国内调查工作尚未开展，考古工作刚刚开始，所以文中实例多引自外人书籍或国外博物馆藏品。原稿仅存文字。今酌量配选一些图版，以供参考。本书所用全部插图均由林洙配选。

前言

●林洙

这本书是根据梁思成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在东北大学时，讲授“中国雕塑史”的讲课提纲，配以图片（原稿没有图片）编辑而成的。当时很多重要的历史遗址尚未发掘，而梁思成在讲授此课时，也尚未到云冈、龙门、天龙山、南北响堂山、敦煌、大足等地去实地考察过。但他在美国学习时期，及赴欧洲旅游时，在欧美各处的博物馆中，看到帝国主义者从我国掠走的大量雕塑珍品。他往往在这些雕像之前久久徘徊、流连忘返。这时期他也熟读了不少欧洲及日本学者的有关著述。这份讲稿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的。

虽然那时梁思成尚未到云冈、龙门、天龙山、大足……这些佛教圣地去考察过，但他对我国的雕塑已有很深的研究。记得有一次他与陈植先生^①一起去拜访陈叔通老先生，陈老先生酷爱文物，家中收藏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佛像。陈老先生看梁思成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他的收藏，因而指着一尊塑像对他说“如果能猜出这尊像的年代，我就把它送给你。”没想到梁思成竟脱口而出说“这是辽代的。”把陈老先生吓了一跳。虽然这只是一句戏言，但陈老却执意要把这尊昂贵的文物送给梁思成。

到了三十年代，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学社同仁，陆续前往云冈、天龙山、龙门、南北响堂山、山东历城神通寺千佛崖等地考察。抗日战争时期，他又与刘敦桢等赴四川，沿岷江流域、嘉陵江流域、夹江两岸及广元、大足等地对摩崖石刻作了半年多的考察。至此他对我国雕塑的研究已是造诣很深。

一九四七年他赴美国讲学，曾参加庆祝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二百周年的学术活动，并做了“唐宋雕塑”及“建筑发现”两个学术报告，得到了极高的评价。这次学术活动使他在这个学科获得了很高的荣誉。要知道与会者并非一般的听众，而是六十多位研究远东文化的专家学者，为此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费慰梅^②说：正是他首次把四川大足的雕塑艺术介绍给国际学术界的。他从美国回国时，曾对陈植说准备写一本“中国雕塑史”。回到清华后在教学中，也开了“中国雕塑史”这门课。可惜在一九五二年教学改革中把这门课取消了。

至今清华建筑系五十年代的学生，还清晰的记得，梁家那大大小小的金石佛像和明器。他还常常要学生看一个白色的小陶猪，问学生欣赏不？如果你摇摇头，他就哈哈大笑说：“等你能欣赏时，你就快毕业了。”你若点头，他就考问你为什么？有一次我被他考了之后要他给我讲讲，他哈哈一笑说：“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我生气了说：“那你就不是个好老师。”他看我真急了，就拉着我的一只手，要我顺着小猪的脊背从上往下抚摩，并说“你看这条曲线，这么刚劲有力，这和圆滚滚的猪好像不是一回事。但你看这整个陶猪，却又是这么惟妙惟肖。”

人们也绝忘不了，那双踏在直径仅二十公分的莲花上的一双小胖脚丫。

^① 陈植，我国著名建筑大师，陈叔通的侄子。

^② 费慰梅（Wilma Fairbank），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之妻，她是研究东方艺术的专家。

那是他在佛光寺后山拾来的。佛像的身子已毁了，只剩下这双可爱的小胖脚，他常常拿着这双脚对学生说：“这是唐代典型的佛脚。”他还风趣地在这双脚的背面写上“莫待临时抱”。

还有一个约计四十公分高的汉白玉立佛，那是林徽因父亲林长民的遗物。古籍《陶斋吉金录》中，还有记载。

可惜这些珍品全部在文革期间被当作迷信物品抄走，至今下落不明。

奇怪的是梁思成四十年代以后，有关“中国雕塑”的讲稿却只字无存。一九八六年我赴美访问时，曾到他讲学的耶鲁大学，想找到他当年的讲稿，但我只找到一套中国雕塑的幻灯片，文字资料无影无踪。台湾的黄健敏先生亦曾专程到普林斯顿大学查找当年学术会议的文件，也没有找到讲稿。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一九四九年以后梁思成一直想写一本“中国雕塑史”，但因为《营造法式》的研究尚未最后结束，一时抽不出时间来写。等到《营造法式》的工作结束时，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晚了。

对雕塑我是个门外汉，当我一九八二年开始整理这份书稿时，根本没有到云冈、龙门去过。到哪里去找这些图片呢？于是我首先熟读他的讲稿，反复琢磨书中描述的内容。然后先从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善本库及日文书中找到了秦以前的大部分图片，又在故宫博物院张研究员的指导下，得到商周的部分铜器图片。这使我增强了信心，决心一定要把本书的插图配全。

中国营造学社的图片档案，解决了本书大部分有关云冈、龙门，山东、四川的图片，我又从龙门石窟研究所、云冈石窟保管所得到了一些更精美的图片，他们都热情的给以支持。还有南京栖霞寺塔的八相图，角直保圣寺的唐塑、四川自贡市荣县大佛，也都是素不相识的朋友帮助拍摄的。

我感到困难最大的是查找瑞典作家喜龙仁的一本书，因为很多图片都引自此书。但开始我并不知道作者是喜龙仁，在梁稿中仅写见0书第×××图。这是一本什么书呢？我到中央美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将西文书中有关中国雕塑的、作者是0字打头的书都借来查阅，均一无所获。最后到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咨询部求援。我向他们说明来意，很难为情地告诉他们我不知道书名，也不知道作者的全名，只知道打头的字母是0，书中插图在二百张以上。感谢咨询部同志的热情帮助，他们终于在善本书库中找到了这厚厚的三大本喜龙仁著的《中国雕塑》。除此以外书稿中还列举了不少美国博物馆的展品，怎么办呢？我只好写信给思成的好友费慰梅，告诉她我遇到的困难。不久，她从美国寄来了我需要的图片。于是国外的资料也顺利地解决了。

这些插图大部分是梁文中指名提到的，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根据书中所述年代、品名及收藏地点选配的。至于文字部分因原稿字迹潦草，编者又缺少雕塑方面的知识，在编辑过程中，只能抱着《辞海》和《康熙字典》，根据原稿字形上下文意思确定。限于编者的水平，不当之处请读者谅解。该书全文及图片均由陈明达先生最后审定，校注亦是陈先生所写。

图片的工作，前后用了几乎一年的时间，得到了众多热心朋友的帮助。有的朋友我连他们的姓名都不知道。最后我想说的还是那句老话，感谢朋友们的热情帮助，如果没有这么多热心朋友的帮助，这本书的问世是不可能的。

一九九七、四

中国雕塑史

上 古

传谓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三，以象天地人；烹牲牢于鼎，以祀上帝鬼神。黄帝既崩，其臣左彻削木为黄帝像，率诸侯朝祭之。然此乃后世道家之言，不足凭也。

帝尧之时，鸾雏来集，麒麟来游。只支国献重明鸟，国人多刻铸鸟状以驱魑魅。

帝舜祀上帝山川鬼神，作五瑞玉器，多以圭璧。此时盖尚在石器时代，故兵器俱石制。尧舜之时天下泰平，故武器化为礼器，如石斧化作圭，圆形石饼化作璧。唐时发舜妃女英冢，得大珠及玉碗，足征当时玉器之发达也。

三代——夏

大禹定天下，“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为九鼎，图以山川奇怪鬼神百物，使民知神奸，则入山林川泽，魑魅魍魉莫能逢之，以承天休。其后鼎迁于商，复迁于周。至周定王时遂有楚子问鼎，王孙满对之事。至显王四十二年，姬氏德丧，九鼎终没于泗水。秦始皇二十八年，过彭城，发千人入水求之，终莫能得。

当时铜器铸造术渐精。铸鼎象物，装饰渐见，遂成“浅刻”（Basrelief）。盖人类因需要而制器，器成则思有以装饰之，实为最自然之程序。三代花纹之形式，盖于此时已成矣。《礼记·明堂位》谓山罍为夏后氏之尊。《礼记正义》谓罍为云雷，画山云之形以为之。盖三代铜器所最多见之“雷纹”，实始于此时也。罍之彩饰多用黄金，遗物中镶金者甚多，今故宫及古物陈列所尚可见。

夏后虽已入铜器时代，然玉石之用仍广。禹治水功成，帝舜赐以玄圭，玉器也。《尚书·夏书禹贡》谓扬州及荊州有金三品（金银铜），扬州有瑶琨，豫州有磬错，梁州有璆铁银镂，雍州有球琳琅玕，金玉出产甚丰，雕琢之术盖亦进矣。

三代——商

至殷商而工艺渐繁，于是天子有六府六工之制。六工者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也。《韩非子》谓殷人雕琢食器，刻镂觴酌。至于塑像一方面，则有晋卫之人镌石铸金，以为师延像以祀之。又有武乙无道，作偶人，谓为天神而搏之。纣为象箸，犀玉之杯，可知当时在象牙、犀角、玉石等等工艺雕刻亦必甚发达也。

商代遗物中铜器不多，如《宣和博古图》所载之父己鼎若癸鼎，及《西清古鉴》所载之父乙，丁，祖辛，父癸，若癸，皆铸饕餮雷纹（第一图）。

玉器遗物中有北平黄氏之躬圭，下有横纹三道，圆孔，再上则异面，非人非兽，雕工甚佳（第十一图）。

近年殷墟（安阳）出土器饰龟甲尤多。象牙，犀角，牛骨，雕刻甚多（第九、十、十二图），刀痕犹劲，刻工细巧。去年李济之博士在殷墟从事发掘，出土者有半身石像一躯，无首无足，全身有雷纹，盖纹身之义欤。李先生以为此石像之用为柱础，其言亦当。此外更有铜贝一，径约三寸，精巧有如希腊全盛时代物，良可贵也。

三代——周

周承二代之盛，集中华文化之大成。文物制度俱备，粲然为旷古所未有，故孔子叹赞，有郁文从周之语。

周代遗物，铜器最多。考之古籍，《周礼·春官》宗伯之下有司尊彝之职，掌六尊六彝，皆宗庙之祭器，大司乐之下有钟师铸师。司徒之下有鼓人，掌六鼓四金。四金者，金鎛以和鼓，金镯以节鼓，金铙以止鼓，金铎以通鼓。

在金工方面，有六工之制，曰攻金六工。筑氏为削。冶氏为杀矢及戈戟。桃氏为剑腊。鳧氏为钟。■氏为量。段氏为铸器。

至于所用之金，则有所谓六齐者¹金六分，锡居一，齐钟鼎；金五分，锡居一，齐斧斤；金四分，锡居一，齐戈戟；金三分，锡居一，齐大刀。金五分，锡居二，齐削矢；金锡相半，齐鉴燧。筑氏执下齐，冶氏执上齐；锡多为下齐，锡少为上齐。

铜器之中，虎■二彝及大尊为虞制，鸡尊，黄彝及山尊（罍）为夏制。鬯彝著尊为商制。鸟彝（第二图）及牺尊、象尊为周制^①其中尤以牺尊、象尊为研究雕塑史之主要材料（第四、七图），《宣和博古图》，《西清古鉴》皆多载之。今多存故宫博物院。其中尤以散氏盘为最著（第五、六图）。然其所以著者，以其款识文字之多，研究者，实未曾有以雕刻家眼光看之者也。

若观周代铜器，总合而归纳之，可得下列诸特征（第一、三、五、七图）：

（一）深刻、浅刻并用，或全器面俱有纹或横圈。深刻部分多为夔或饕餮。浅刻部分为雷纹。

（二）重要部分加以脊骨。其断面小则圆，大则方，且多节断，折钩等形。

（三）小圈横带圈。■

（四）脚部周绕多有弦纹。■

（五）所有主要花饰多以动物为主。

至于传记中，更有有趣之记载，则《孔子家语》中之金人铭。“周太庙之侧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中之金人，盖亦我国铜像中之最古者也。

至于玉器，尤为周代礼节中之必需品。安邦国则有六瑞；（王，镇圭；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②。）礼天地四方则有六器；礼天以苍璧；礼地以黄琮；礼东方以青圭；礼南方以赤璋；礼西方以白琥，礼北方以玄璜。用玉之途甚广，用玉之风甚盛，玉在当时社会中实占重要之位置。其价可使“小人怀璧其罪”，其高尚可使“君子比德于玉。”又能使孔子“鞠躬如也”。

至战国之世，重玉之风益甚。郑伯许璧以假田，固可知当时玉价。然如秦昭王之以十五城易和氏玉，更有如蔺相如者冒生命之危险以还璧，盖亦中外古今所未有也（第八图）。周代遗玉极罕，见于《宣和博古图》及其他古籍者不过十余事。唯日本竹内氏所藏璊玉琮，作圆圈形，首尾衔接刻作龙形，雕琢奇古，盖三代之遗物也。

¹ ①《周礼·考工记》。

①《周礼·春官小宗伯鸡人》。

②《周礼·小宗伯典瑞》。

建筑雕饰遗物有宗周鄠宫瓦，见于《金石契》及《金石索》，内有■字、外绕以四神之饰（第十三图）。孔子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可知俑像在孔子时已成习俗沿用物，惜无遗物可考耳。

周代雕刻师中有鲁班者，称绝世妙手，不唯擅雕刻，且作木鸢为楚攻宋（墨翟为云梯以御之），作木人以御木马木车，盖亦极巧之机师也。

秦

阿房——备房闾，缮廐库，雕琢刻画，玄黄琦玮。

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收天下兵，销锋镝以为金人十二，以约天下之民。

作渭桥，孟贲像。

“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其一今在成都圣寿寺。

鸿台瓦（第十五图）。

始皇墓，周五里，高 50 余丈，穿三泉下铜而致槨。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上具天文，下具地理。项羽发之，三十万人运三十日始尽（第十四、十六至十九图）。

封演曰，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

玉玺、秦印。

两汉

汉族文化至六朝始受佛教影响。秦汉之世，实为华夏文化将告一大段落之期。上承三代之盛，下启六朝之端，其在历史上盖一极重要之关键也。先秦雕塑遗物，既罕且贵，今日学子之能见者，不过若干铜器及极少数之玉器耳。其在雕塑史上实只为一段绪言。及乎两汉，遗物渐丰。时值天下一统，承平盛世，民有余力以营居室陵墓，日常生活亦渐安适，其遗迹在在皆有，而今日治雕塑史者亦较感其易，不若三代之难考也。

汉代遗物中墓室碑阙实为最要。宫苑装饰唯余数瓦。日常用品则以镜为主体，他如虎符印章之类，为数靡少。且多经历代好古之考玩，材料较易搜集。

《三辅黄图》谓汉宗庙，“宗”者尊也，“庙”者貌也，所以仿佛先人尊貌者也。汉代雕像祭祀之风盖必盛行，惜“尊貌”多木雕泥塑，今无复有存者。唯有征诸古籍耳。

至于陵墓表饰，如石人，石兽，神道，石柱，树立之风盛行。又有享堂之制，建堂墓上，以供祭祀。堂用石壁，刻图为画，以表彰死者功业。石阙石碑，盛施雕饰，以点缀墓门以外各部。遗品丰富，雕工精美，堪称当时艺术界之代表。职是之故，在雕塑史上，直可称两汉为享堂碑阙时代，亦无不当也（第二十六至二十八图）。

陵墓表饰之见于古籍者极多，如张良墓之石马，霍去病墓之石人石马，张德墓之石阙石兽、石人、石柱、石碑皆前汉物。唯霍去病墓石马及碑至今犹存，马颇宏大，其形极驯，腿部未雕空，故上部为整雕，而下部为浮雕。后腿之一微提，作休息状。马下有匈奴仰卧，面目狰狞，须长耳大，手执长弓，欲起不能。在雕刻技术上，似尚不甚发达，筋肉有凸凹处，尚有用深刻线纹以表示之者（第二十图）。

霍去病墓——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 117 年。

俑及明器——三俑（第二十一至二十五图）。

曲阜诸王墓——恭王，景帝三年（公元前 154 年）封于鲁，二十八年薨（公元前 126 年），及子孙。卒及亭长，高六尺八寸及七尺一寸。最古。

宫苑及建筑装饰

元鼎元年（公元前 116 年），立通天台于甘泉宫。高二十丈，以香柏为殿梁，香闻十里，故亦称柏梁台。台上有铜柱，高三十丈，上有仙人，掌擎玉杯，受甘露于云表，谓之承露盘。盘大七围，去长安二百里之遥已望见之。元封间，柏梁召灾，椽桷皆化龙凤从风雨飞去。可知台之建筑，椽桷乃饰龙凤。然以铜器高入云霄，最易引诱落雷，柏梁台不得不灾，传谓灾时风雨，可以证之。

柏梁灾后，武帝更信方士言，立建章宫。前殿之东立凤阙，高二十五丈，而在其上立铜凤凰以胜灾。班固《西都赋》所谓：“设璧门之凤阙，上觚棱而栖金爵”是也。

然此等大雕饰惜无存者。存者唯瓦砖耳。

《金石索》有甘泉宫瓦，作飞鸟图，字曰：“未央长生”（第三十图）。有上林苑白鹿观瓦当，图作鹿形，颇似甘泉宫飞鸟瓦（第三十一图）。汉砖

遗物中有长袖对舞之舞人砖，有飞鸟走兽之群兽砖，有执戈骑御之纪功砖。盖多陵墓中物。东北大学所藏人物砖，盖汉阙檐角所常见之人形欵（第二十九、三十二图）！

金玉雕刻

汉代日用雕刻小品遗物，以金玉为多。汉沿周秦之制，器皿多用铜质。而玉在社会上，尚保持其尊贵之位置。时西域交通渐繁，材料渐丰，故汉代玉器甚多。皇帝六玺皆以白玉，上有螭虎之纽，皇后则用金玺焉。

《古玉图谱》载汉玉器三十余件，其图皆欠精确，无以见其精美，更无从辨真伪，兹不赘。其他遗品中，有蝉形含玉，多简洁。刀法苍劲。有玉佩，多圆形，上多刻吉祥语，亦有龙凤形者。黑木氏所藏瑞玉子母鸳鸯玉杖者，结构卓绝，刻线刚劲，然是否汉物，尚待考也。

汉金器遗物甚多。各种器皿如尊壶书镇等甚多。沈阳故宫博物院所藏天鸡尊（第三十三图），凫尊，神兽壶皆其佳例。其形制大致似周，虽不及周器之高古森严，然较之后世之物，其强劲典雅之致尚存焉。其中神兽壶尤为有趣，全壶横分为八带，最下带为壶脚，作几何文；自上数第五带为雷纹，其余皆铸禽兽像，尤以第三四带之刺豹（？），及斗牛图为有趣。其刀法略似武氏祠石而生猛过之（第三十四图）。

考诸《陶斋吉金录》，《金石索》等书，汉宣帝，元帝，成帝间铸鐙（灯也）颇多，多宫中物，其铭多先标何宫，何物，何年，何人（工）造，重量几斤几两。其工之可考者甚多，盖皆当时少府所属宫工也。

铜镜亦汉遗物之重要者。其中有年号镜，俱桓灵以后物，盖铭鉴年月之风，至汉末始行也。由花纹种类别之，汉镜可分三种。一，欧洲学者所称为“TLV 镜”者是（第三十七、三十八图）。圆镜中心有方形，方圆之间乃在四方及四角上作TVL等纹。二为“八觚纹镜”（第三十五图），在各同心圆圈间作八圆觚。三为“人物镜”（第三十六图），由几何纹渐进至自然形，盖镜之后铸者也。

汉印之流落于北京琉璃厂者颇多，费金无多，可得精品。其篆纽往往有可取者，其字既佳，其纽尤美。按之汉仪，皇太子印用黄金龟纽，诸侯王用黄金橐驼纽。龟与橐驼尚可保存，而黄金作纽，则无觅处矣。

汉铜之最奇罕者莫若虎符。罗振玉先生藏阳陵虎符尤为精美（第三十九图）。罗氏称为秦虎符，然阳陵地名，实景帝改戈阳后始有之，故当是汉景帝时物。符长二寸九分，作虎形，金错，文曰“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

佛像

佛像虽于明帝时传入中国，然而未即传播，东汉之世，可称其最初潜伏期。至桓帝笃信浮图，延熹八年，于宫中铸老子及佛像，设华盖之座，奏郊天之乐，亲祀于濯龙宫。此中国佛像之始也。

按佛教原非礼拜偶像之教。佛灭度后甚久，尚无礼拜佛像之风。虽有塔庙讲堂等建筑，然塔则以纳舍利子，庙则以安塔。建筑中有画雕佛传及本行图，然其观念非如后之佛像也。明帝梦金人而遣蔡愔等至天竺求经，愔等得

佛经及佛画像，并竺法兰及迦叶摩腾二比丘还洛阳。然此非塑像也。明帝以后，至公元后一世纪（汉和帝时）健陀罗古建筑中始见佛像雕刻，是为造像之始，盖深受希腊影响者也。此后三四百年间，健陀罗佛像传世者甚多。而中国受健陀罗美术影响尤重也。

三国、两晋

三国之际为雕塑极不发达之时代。遗物中之可评定为此时代者极少。唯镜之有年号者尚有数件，然此镜实仍汉制，由艺术上言，直可称为汉镜；其雕饰仍谨沿汉代多用之各种花纹，所异者唯技较巧而摹写较实耳。

宫苑雕刻之可述者，有魏明帝洛阳总章观之铜凤。观高十余丈，建翔凤其上。曹操墓之铜驼石犬亦为当时重要雕刻。

两晋有太极殿，殿前有楼，屋柱皆隐起龙凤百兽之形，雕斫众宝，以饰楹柱。

晋代实为中国佛教造像之始。最初泰始元年，月支沙门昙摩罗刹（竺法护）至洛阳，造像供奉。为佛像自西域传来之始，继之有荀勖造佛菩萨金像十二躯于洛阳。其后佛寺渐多，造像亦盛，然遗物则惜无存者。

当是时（建元二年，公元 366 年）沙门乐僊于敦煌凿石为窟。乐僊至山，见金光千佛之状，遂就崖造窟一龛，法良继之，营窟于僊之旁，伽蓝之起，实滥觞于二师，其后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次第造作，至唐圣历间（公元 698—700 年）已有窟千余龛。故亦名千佛崖。

《西域水道记》谓乾隆四十八年，沙中得断碑，曰：“秦建元二年沙门乐僊立”，后又没于沙中云。然而莫高窟者，实中国窟龛造像之嚆矢，云冈，龙门，天龙山及其他刻崖，皆起西陲而渐传内地，此晋代在雕刻史上最大之贡献也。

晋代有人焉，为中国雕塑史中一极重要人物，戴逵是也。逵字安道，风清概远，留遁旧吴，宅性居理，心游释教。且机思通瞻，巧拟造化。作无量寿木像，研思致妙，制定精锐，常潜听众论，闻所褒贬，辄加详改，委心积虑，三年乃成，振代迄今，实未曾有。此木像与师子国玉像及顾恺之维摩图世称瓦棺寺三绝。安道实为南朝佛像样式之创制者。而此种中国式佛像，在技术上形式上皆非出自印度蓝本，实中国之创作也。

南北朝——南朝

自南北朝而佛教始盛，中国文化，自有史以来，曾未如此时变动之甚者也。自一般人民之思想起，以至一物一事，莫不受佛教之影响。而艺术者一时代一民族之象征，其变动之甚，尤非以前梦想所及者。在雕塑上，至第五世纪，已渐受佛教之浸融，然其来也渐。在此新旧思想交替之时，在政治历史上已入刘宋萧梁，而佛教尚未握人生大权之际，有少数雕刻遗物为学者所宜注意者。其大多数皆为陵墓上之石兽。多发现于南京附近。南京为南朝帝都，古称建业，宋、齐、梁、陈皆都于此。附近陵墓即其帝王陵墓也。陵墓在今南京附近，江宁，句容，丹阳等县境内，共约十余，其坟堆皆已平没，然其中柱，碑，翁仲等等尚多存在者。瑞典学者喜龙仁（Siren）所著《中国雕刻》言之甚详。

其中最古者为宋文帝陵，在梁朝诸陵之东。宋陵前守卫之二石兽，其一尚存，然头部已残破不整。其谨严之状，较后代者尤甚，然在此谨严之中，乃露出一种刚强极大之力，其弯曲之腰，短捷之翼，长美之须，皆足以表之。中国雕刻遗物中，鲜有能与此赳赳比刚斗劲者。

萧梁诸墓刻，遗物尤多。始兴忠武王萧憺（普通三年，公元522年薨）碑，碑头螭首，颇似汉碑。吴平忠侯萧景及安成康王萧秀，俱卒于普通年间，故其墓刻俱属同时（公元六世纪初），形制亦同（第四十一、四十二图）。其石兽长约九尺余，较宋文帝陵石兽尤大，然刚劲则逊之。其姿势较灵动，头仰向后，胸膛突出。此兽形状之庄严，全在肥粗之颈及突出之胸。其头几似由颈中突出，颈由背上伸如瓢，而头乃出自瓢中也。其口张牙露，舌垂胸前，适足以增胸颈曲线之动作姿势。其身体较细，无突起之筋肉，然腰部及股上曲线雕纹，适足以表示其中蕴藏无量劲力者。

由其形式上观之，此石狮与山东嘉祥县汉武氏祠狮实属一系统，不过在雕饰方面，较汉狮为发达耳。

然此汉狮梁狮，皆非写实作品，其与真狮相似之点极少。其形体纯属理想的，其实为狮为虎，抑为麒麟，实难赐以真名也。今此石狮及碑柱，多半埋于江南稻田中，遥望只见其半，其中数事已于数年前盗卖美洲，现存彭省大学美术馆。其他数件之命运如何，则不敢预言也。

考古艺术之以石狮为门卫者，古巴比伦及阿西利亚皆有之。然此西亚古物与中国翼狮之关系究如何。地之相去也万里，岁之相去也千余岁。然而中国六朝石兽之为波斯石狮之子孙，殆无疑义。所未晓者，则其传流之路径及程序耳。至此以后，狮子之在中国，遂自渐成一派，与其他各国不同，其形制日新月异。盖在古代中国，狮子之难得见无异麟凤，虽偶有进贡自西南夷，然不能为中土人人所见，故不得不随理想而制作，及至明清而狮子乃变成狰狞之大巴狗，其变化之程序，步步可考，然非本篇所能论及也。

南朝造像现存者极少。就中最古者为陶斋（端方）旧藏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铜像。高约一尺三寸。两肩覆袈裟，颇似健陀罗佛像。然在技术上毫无印度风。其面貌姿态乃至光背之轮廓皆为中国创作，盖戴安道所创始之南朝式也（第四十图）。

美京华盛顿（Freer Gallery）藏元嘉二十八年铜像一躯。光背作叶状，上镌火焰纹，而有三小佛浮起。大致与十四年像同。

当是时，戴安道之子名颢者，字仲若，肖其父，长于才巧精雕塑。安道

作像，仲若常参虑之。仲若作品之见于记载者颇多。济阳江夷与仲若友善，为制弥勒像，后藏会稽龙华寺。又修冶绍灵寺及瓦棺寺丈六金像二躯。又作丈六金像于蒋州兴皇寺，隋开皇间寺灾，迁像洛阳白马寺。此外戴氏父子制像颇多，然实物乃无一存焉。